

● 高 见 主编

中国外交官

风云录



红旗出版社

中国外交官风云录

高 见 主编

红旗出版社

1993.9
DIPLO
(京)新登字 108 号

中国外交官风云录

主 编:高 见

责任编辑:王农媛

封面设计:王中兴

出 版: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昌平第二印刷厂

787×1092 32 开 12.5 印张 281 千字

1993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1993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INBN 7-80068-569-1/Z · 182

定 价:8.40 元

目 录

上 篇

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2)
孤独的先行者.....	(2)
大风吹蹙洞庭波.....	(5)
湘军高参.....	(9)
洋务活动家	(14)
宦海浮沉	(20)
公使生涯	(26)
公使无夫人	(41)
“终为一中国人”	(44)
薛福成：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外交官	(46)
弃八股而攻经世实学	(47)
抵御外侮	(51)
《筹洋刍议》	(54)
浙东筹防	(57)
收利权而销外侮	(59)
解放思想，走向世界.....	(65)
中国富强之本原	(71)
外交官的改良思想	(73)

“待凭口舌巩河山”：曾纪泽外交风云录	(76)
曾国藩的长子	(76)
万年奇局中西通，朝中谁人堪此任	(79)
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108)
满腔愤血，何处可洒	(136)
 “历练有识”：中国杰出的外交官黄遵宪	 (147)
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	(147)
中国第一位驻日参赞	(152)
旅美侨民的“父母官”	(158)
“碌碌成何事，有船吾欲东”	
——黄遵宪在英国	(164)
黄遵宪与新加坡华侨	(168)
回国以后的外事活动	(172)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遵宪的变法活动	(175)
生当作铁汉，死亦化金刚	(179)
 中国外交奇才顾维钧	 (181)
年青漂亮的小脚女人、中国国务总理的千金	
多财善舞的糖王娇宠、温柔迷人的“爱的花”	
——外交奇才的4个妻子	(182)
好风凭借力	(190)
一鸣惊人	(194)

外交奇才纵论外交·····	(207)
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212)
外交耆英的仙逝·····	(215)

下 篇

外交战线上的张闻天 ·····	(218)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共领导人中杰出的一位·····	(219)
“我们的好大使”·····	(221)
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拓荒者·····	(224)
师哲：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中国外交官 ·····	(230)
这位中年人不禁兴奋地加快了脚步·····	(230)
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231)
紧紧握住毛泽东主席那双巨手·····	(236)
“这下你也解放了！”·····	(239)
米高扬想捶自己的翻译，却害苦了师哲 ·····	(241)
斯大林话一出口，四座皆惊 ·····	(245)
随同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	(247)
赫鲁晓夫不明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	(259)
“老子党”乎？“老大哥”乎？·····	(261)
师哲的头衔是“政治顾问”·····	(263)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	(269)
伍修权：渡尽劫波在，沧海一声笑 ·····	(271)
峥嵘岁月稠·····	(271)

纵横捭阖于外交舞台·····	(287)
“奋斗一生如一日,晚晴高唱晚节歌”·····	(315)
在任于多事之秋的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	(324)
友好的使者·····	(324)
良好的开端·····	(328)
陪同中苏高层领导人互访·····	(330)
特殊身份的驻苏大使·····	(336)
中苏关系从友好到冲突的见证人·····	(342)
离任前夕·····	(351)
朱霖:外交家夫人的外交生涯 ·····	(353)
我们的主人公·····	(353)
出使匈牙利:外交实践第一步的泪与笑·····	(355)
出使印尼:乘亚非会议之春风走向成熟·····	(363)
出使法国:滔滔洪水的短暂侵袭·····	(369)
出使美国:最后一站的辉煌·····	(378)
外交家夫人的另一种故事·····	(386)
主要参考书目 ·····	(391)
后记 ·····	(394)

上 篇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西人之始至也，非始睥睨中国也。曩者禁烟之议，既以发之骤而启衅；衅作矣，彼犹惧天威之不测，未敢狡焉以逞也。忽而罢兵弛禁，且偿其货以骄之；继而倏战倏和，茫无成议，以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于是中国之情实，历历在西人之目，索地索币之师，纷然狎至。

薛福成：《上曾侯相书》

中国 第一位驻外公使 郭嵩焘

孤独的先行者

挈舟出海浪滔天，
满载痴顽共一船；
无计收帆风更急，
那容一枕独安眠。

那是1876年12月初的一个雨夜……海浪扑打着船舷。郭嵩焘紧抓船栏，一任风雨的吹打，透过夜幕和雨雾，他仍依稀得见渐渐消失在远处的海岸和亲切的灯火。此时，在跨出国门的时刻，他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前一年，马嘉里案发生后，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并且要中国派使赴英赔礼道歉。在侵

略者的武力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答应这一要求。这件倒霉的差事最后落到了以通晓洋务著称的郭嵩焘头上。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虽然支持他出使，也深深为他惋惜，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其他友人如李鹤年、冯誉骥等更都“正言切论”，劝他千万不要干这种丢人的事。一向佩服郭嵩焘学问的李慈铭，在致友人书中谈及此事，云“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在日记中，李慈铭大加评论，说派使出国的起因是有人建议派人赴外洋了解敌情，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夷人”像猪狗一样，是不可理喻的，中国派使出去，无异于古代被扣的人质，“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真是“志士所不忍言也”。还有人编出一幅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满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悠悠之口，无以谅之，好像郭嵩焘顷刻变成了卖国的大汉奸，连他的学生、亲友也无法替他说一句辩解的话。有一位好心的前辈还给他算了一卦，看看出洋到底是吉是凶。结果是“大凶，主同室操戈。日在昏晦中。势且不能成行，即行亦徒受蒙蔽欺凌。”

闹得最厉害的还是他的家乡湖南。湘省封建传统极严，最恶洋人。听说郭嵩焘竟然要出使外国，群情激愤，对论郭筠仙出使“英夷事”。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对郭嵩焘出使英夷横加指责。有人造谣说，上林寺（该寺由郭嵩焘创修，寺中和尚西枝与郭嵩焘友善）内住有洋人，是由郭嵩焘勾引到湖南来传教的。这一下更激众怒，失去理智的文人学士一把火烧了上林寺，西枝和尚只好逃之夭夭。考生们又扬言要砸郭嵩焘家，并把谴责郭家藏匿西枝和尚的檄文贴到郭宅，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湖南巡抚王文韶一向厌恶郭嵩焘谈洋务，闻讯后心中大喜，不但

不制止，反而火上加油，夸奖闹事者士气可嘉。郭嵩焘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恭亲王奕訢为此发函责问王文韶，王置若罔闻，不了了之。一个二品大员的家被闹得如此乌烟瘴气，惊动奕訢亲自过问，王文韶居然敢敷衍了事，自然是因为有从京师到地方的强大舆论作后盾。郭嵩焘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根本原因并不在他参弹岑毓英（时署云贵总督，据称马嘉里遇阻被毙得其默许，郭参其处置不当），有“依附洋人”的嫌疑。在《烟台条约》上签字画押的李鸿章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相反，官僚士大夫们非常谅解，说是“值此中外多故，不得不委曲维持”。妥协、投降，古已有之，官场自有天衣无缝的辩解，所谓“舆论”也并不去求全责备。郭嵩焘大遭忌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宣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

传统的观念是“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必须“严夷夏之大防”，实行彻底隔绝。郭嵩焘则说：“茫茫四海有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馀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何况近世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要隔绝也无从隔起。

传统的观念是只能“用夏变夷”，决不能“用夷变夏”。郭嵩焘则说：“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

传统的观念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洋人纵有坚船利炮，而“天朝上国”的政治教化天生地伏于外洋，自然能够“万世长存”下去。郭嵩焘却说：“西洋从智力相胜，垂二千年，……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

以上事实说明,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他的思想突破了咸同时期大多数谈洋务、办洋务人的水平。他是鸡群中的鹤,高出同侪很多。他的思想没有停止在坚船利炮之类东西上,而能“由表及里”,进一步接触到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他看到闭关自守的危机,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在西方新鲜空气吹来时头脑比较清醒。正如在本文开始所引用的其诗中抒发的那样。封建末世的中国,外部环境正值“浪滔天”“风更急”;和他同命运的士大夫阶级,却犹如满满“一船痴顽”,即“无计收帆”,又不忍心独自安睡。一方面,国人皆睡唯我独醒;另一方面,风雨欲来风满楼,危机迫在眉睫,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怎不忧心如焚?为了国家利益,为了能去实地考察一下西方社会,将真实情况介绍到中国来,使人们从“醉梦之中”清醒过来,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接受使命,担起这副费力不讨好的担子,以59岁的老病之躯,于1876年12月2日晚,偕如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及英国人马格里,还有随行英文翻译爱尔兰人禧在明及随员、仆役等30余人“为洋人所促,冒雨登舟”,踏上出使英伦之路,成为我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大风吹蹙洞庭波

1818年4月(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地主家庭。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也写作云仙或筠轩、仁先,晚号玉池老人。因他的书斋自名“养知书屋”,故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先祖原籍江西吉安,明朝万历年间迁至湖南湘阴。他

的曾祖父名熊，字梦兼，号望湖。这位望湖君“善居积，富甲一邑”，为湘阴望族。他的祖父名詮世，号括矩，“性豪，然喏一语，千金不惜，人以乏告，必有以应。县令某贷重金而死，其家请以两美婢偿，却而焚其券。”到了他的父亲与伯父分家时，“日趋虚乏”，家道中落，郭家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以至“田租无所出”，全家往往不能举餐。

从以上有关他家族史的不多的材料来看，他家并非依靠收取田租一般的地主，他家致富原因是由于经商和放贷。19世纪初期，洞庭湖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城镇已经集中了一定数量的居民和财富，借贷资本已经同商业资本一道在城镇经济中出现。郭家的情形，与通常自谦为“耕读传家”即以地租为收入来源，以做官为发展方向的地主不同，其封建性可能较少，而具备着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条件。郭嵩焘这种家庭出身影响了他以后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的形成，即是他很少有传统士大夫的轻商思想，他提倡“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

郭嵩焘的曾祖、祖父、父亲尽管都是读书人，但三代人都没有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最多读到贡生（曾祖）、秀才（祖父）。据郭嵩焘回忆，他父亲、伯父、叔父与朋友“以诗唱和，或一日数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诗以归，已而尽弃去，不自收拾”。几句话活现出几位文人学士洒脱飘逸的形象，与“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刻苦攻读比，颇有与正统不大协调的味道，这也许就是他们不能一举成名的基本原因吧？郭嵩焘自己就说过“少习辞章之学，洎壮治经史，不能专”，似乎正是继承了乃父家风。从这不多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寻觅到郭嵩焘后来不能专于封建正统、喜谈洋务的思想基因。

郭嵩焘自幼聪慧过人，他的父辈都看出他有与众不同之处。

某天，郭嵩焘正在构思一篇作文，天气极热，家人都到屋外房檐下乘凉去了，他却默坐在屋里苦思冥想。忽然传来他伯父的声音，说“龄儿遇事洵洵，独其读书为之，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然观其志意，无几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听到伯父盛赞自己作事虽小心翼翼，但所写文字中透出一种独特的英气，决不人云亦云，日后定有作为，小小的郭嵩焘心里感到美滋滋的，非常高兴。他的伯父看得很准，郭嵩焘性格中这种独立的气质，不肯附和世俗见解，执著追求真知的勇敢精神，在少年时代就已露端倪。其特征是：外貌温恂，但思想非常活跃，精神活动属于“进取型”（若猛兽鸷鸟之发）；好胜心强，“无几微让人”；才识出群，但不免急于求名，过于自负。另外，其弟崑焘曾说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这说明他脾气不好，在别人眼里就是傲慢。

封建社会里赋有如上性格的读书人，得志可能踔厉风发，纵横如意；不得志则往往入于狂狷者流，像历史上的屈原、贾生那样，在政治上或文化上为反对派。郭嵩焘走的有点近乎第二条道路。

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第二年，他开始在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是年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19岁，“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这是三人共同之处。但曾、刘攻程、朱理学，以封建卫道士自任，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方向发展，郭则“精研词章”，带着更多的离经叛道的文人反对派的气质。后来曾国藩评论郭嵩焘“芬芳悻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认为他只能著书立说，不胜任官场的“繁剧”工作，大约就是嗅到了郭嵩焘身上的异端气味。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这场暴风骤雨,成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在野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契机。湖南这块地方,一变历史上长期沉寂,“少人多石”的状态,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郭嵩焘写过《湘中竹枝词》四首,赞颂这种当时在他看来是令人感奋的局面,其四云:

捶鼓家家起荷戈,大风吹蹙洞庭波;

由来楚境横天下,千里潇湘地几多。

1840年到1852年的“大风”,确实吹蹙了洞庭之波。道、咸以后的湖南,确实是“楚境横天下”,在全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占了一个奇特而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仍旧以保守、“霸蛮”而出名;另一方面,又在各方面都出了不少很大胆、很活跃、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敌意的环境、尖锐的冲突里冒尖,以一种异己的精神面貌和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使得举国上下都为之侧目。甚至可以说,正是敌意的环境中炼出了殊于世的才人,有如暗黑的冬夜将寒星反衬得更加明亮夺目。

这种现象有它地域文化史上的原因。在古代,正如曾国藩所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位于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向岭南和苗僮地区传播的过渡地带,实际上已是“蛮荒边缘”(沈从文不是把他湘西的小说叫做《边城》吗)。近代洋人从广东入侵,湖南又首当其冲。新旧观念在这里互相冲击,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交锋;新形势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显得格外尖锐,旧制度固有的毛病在这里表现格外分明。对于大小事都十分认真而又容易走极端的“蛮气”,在这里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身上也特别强烈。甲午年间到日本游历的黄庆澄,在他的《东游日记》中写道:“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喜。”他在这里讲的是认真坚忍的性格比

浮华易迁的性格易于有成，但也或多或少接触到了湖南地方风气的一种特色。“相反相成、相克相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湖南在道咸之际，突然由“少人多石”一变而为“惟楚有材”，而郭嵩焘正是在此新旧思想交锋之所砥砺成这批“楚材”中一个离经叛道的出类拔萃的爱国知识分子。

湘军高参

伯乐识人荐三将

郭嵩焘颇有知人之明，惜才之心。清庭“中兴”四位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倒有三个（曾、左、李）由其推动他们成名的，别看他们后来出将入相，要不是在关键的时刻郭嵩焘出了力，还不知道他们会走上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1851年终于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大革命。这恰为以曾、左、李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清朝的八旗绿营兵腐败无能，一触即溃，根本无法抵挡英勇善战的太平天国的农民大军，咸丰皇帝被迫诏谕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从此，曾统率的臭名昭著的湘军支撑着中原以南的半壁江山，革命者的鲜血亦铺就了曾、左、李、胡通向京城的官道。前三者的出山发迹正是由郭嵩焘一手促成的。

先说左宗棠。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攻道州，连克江华、嘉禾、桂阳、郴州、湘省各地，“会党蜂起应之”。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地主富豪纷纷逃命，郭氏兄弟及左宗棠

兄弟率眷仓皇避入玉池山梓木洞。此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个举人出身的文官，面对太平军的围攻，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急需通晓军事的人相助。贵州知府胡林翼得知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消息，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助其主军事。当时左宗棠科场失意，正任塾师，并积极经营土地。左宗棠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家潜心研究地理、经济、兵法等各门学问，常以诸葛亮自比，时人目为狂士。张亮基虽没有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亲自登门求左宗棠，却也派人“厚币礼请”。左宗棠视农民起义为盗贼，值此“乱世”未尝不跃跃欲试，想像诸葛亮那样干一番大事业。但真有人找上门来延请时，偏偏要摆出名士架子，“初不欲应”。郭嵩焘力劝左宗棠出山，说：“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胡林翼、江忠源等人也来信敦促，左宗棠于是走马上任，踏上了镇压农民革命，成为“中兴名将”的道路。

郭嵩焘不仅有知人之明，还有惜才之心。尽管后来郭、左颇多齟齬，但郭嵩焘却能抛弃前嫌，利用自己天子近臣救过左宗棠一命。当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协助骆秉章镇压省内农民起义，巩固湘军基地，本人并无正式官职。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自恃能力超群，揽权好胜，事无巨细，常代骆秉章处理，骆氏巡抚几同虚设。于是，“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副都御史，盖以骆公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尚过之也。”湖南实权操于左宗棠之手，将官对其敬畏有加。某天，永城镇总兵樊燮谒见骆秉章议事，向骆行跪拜大礼，对左公一揖而已。左宗棠当即责其行礼，樊燮反唇相讥，言未有朝廷命官向师爷行礼之制。左大怒，竟给樊一记耳光，事后又以骆名义借故将其革职。樊氏愤极，赴京至都察院上告。清廷下令密查，曰如左果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郭嵩焘得知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忙疏通关节，打听详情。此时，郭嵩